

第七章 中国开源参与者的技术文化与意识形态图景

卡斯特（2007）在《网络星河》一书中认为文化主要指一套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互联网文化是互联网创造者的文化。开放源代码参与者作为互联网创造者的典型代表，要考察他们的文化，也是从价值观和信仰入手。根据访谈和观察的结果，本研究主要从技术文化、社群文化、商业文化三方面来归纳和分析中国开源参与者指导行为的价值观与信仰。其中的“技术文化”，是包含了卡斯特所区分的“技术精英文化”和“黑客文化”两部分。按瑞尼和威尔曼（Rainie & Wellman, 2012）的总结，技术精英文化与黑客文化一起奠定了互联网的技术和政治基础。因此本章论述开源参与者们的“技术文化”也将涉及技术和政治倾向（主要指自由观）两方面的归纳总结，即开源参与者的技术价值观是如何，以及由技术实践所衍生的他们对自由、开放等的看法和态度又是如何。二者是交融在一块的，这是因为技术本身就具有其文化特性和政治秉性（查德威客，2010：22）。

7.1 关于技术与文化

由于开放源代码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技术革新，对于计算机技术而言，软件开发就是“那些赋予计算机超常能力的人”（Levy, 2011：33），“他们奉行着与计算机本身雅致的逻辑相一致的理念——共享、开放、分权，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亲自动手改进机器并改善整个世界。”（Levy, 2011：1）而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开发者则是程序员中的翘楚，他们的行动和文化对所有的程序员来说，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因而，他们的行动如何与文化产生互动，同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也是十分相关的：与其说技术对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如说是以开源参与者为代表的行动者，通过他们的行动对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7.1.1 关于技术与文化的两种论调

互联网是技术革命的核心。但关于技术可能把我们带往何方，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体验，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论述。在传播学领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媒介环境学派对此的研究和论述。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这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强调了媒介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媒介环境学谱系中，伊尼斯强调了媒介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伊尼斯，2003）；那么，麦克卢汉围绕人的体验，认为媒介改变着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提出了媒介的感知偏向（麦克卢汉，2000；参见：范小青，2010）；波斯曼则认为媒介有一种隐蔽而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波斯曼，2007）。波斯曼认为，特定的媒介形式会偏向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社会的整个文化体系；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交往模式，引发出了深刻的文化变迁。

波斯曼（2007）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阶段划分，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三个时期。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任何技术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还未完全颠倒，文化还没有向技术投降；走向“技术垄断”阶段之后，技术与人的关系就完全颠倒了，人被技术所裹挟，开始成为技术的附属，成为客体，文化已向技术投降。其现实表现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参见：何道宽，2007）。

与他的观点有类似之处的是马克·波斯特（2010）关于互联网与文化的论述。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具有不确定性，所谓的文化的不确定性，既是指文化原有的疆界被打破，进入了难以名状的新领域，也是指人机关系、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改变和不确定，又是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与经验的获得途径（参见：蒋原伦，2011）。在波斯特眼里，不仅新技术和新媒介是外在于文化的，而且文化也是外在于个人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人被文化所规训（甚至怎样被规训的方式也是相对确定的），而不是个人改变文化。对个体而言，文化是相对强大的一端，个体在其中被改造、被规训就是文化确定性的最好体现（参见：蒋原伦，2011）。从波斯特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抱

有忧虑，而且也不认为个人能对文化有多大的积极意义，认为个人只有被文化所规训的一条路。

波斯曼在其技术与文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到行为人的作用，而波斯特虽然提到了个人，却也只提到个人在文化面前是被动的、被改造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俩对技术（互联网）与文化的论述都相对有些悲观。与他们相反，卡斯特、威尔曼有着不同的看法。

卡斯特（2001：4）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总导言当中明确写道：“后现代文化与理论则沉迷于庆祝历史的终结，以及某个程度的理性的终结，放弃了我们了解的能力，以及制造意义，甚至是制造无意义的能力。其中暗含的假设，便是接受了行为的完全个人化，以及社会对其命运的无能为力。本书逆破坏之流而上，对于各种形式的知识虚无主义、社会怀疑主义与政治犬儒主义提出异议。……我相信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与转变改造的政治有其实现机会，而不必然漂向绝对乌托邦的致命急流……重点并不在于提供解答——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解答，而且社会行动者应该自行找到答案——而在于提出一些适切的问题。”

从他的这一长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没有对未来有很明确的预测，但很显然，他相信社会行动者本身的力量，并认为社会行动者对“命运”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瑞尼和威尔曼认为，“这是一个自由行动者的时代，同时也是倡导个体行动精神的时代”，这一说法是与其不谋而合的。

虽然波斯曼、波斯特、卡斯特、瑞尼和威尔曼的论述对象和论述重点并不完全吻合，但是，在技术和文化的关系上，他们的观点还是可以大致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类，一个是忽略甚至几乎没有提到行动者的作用，忽略了人的力量；一个是充分相信和信任行动者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对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事物都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

另一个重要不同还在于，波斯曼以对印刷文化、书面语文化的推崇作为自己固有的立场。“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何道宽，2010）。”由于互联网文化是全新的一种冲击，与原来的文化相比，必然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他们出于对固有文化被解构的担心和不习惯，而对互联网文化有所质疑。但对于卡斯特、威尔曼和持相似论点的研究

者来说,互联网可能创造了新的文化。而且这种新的文化就是由善于使用新技术的个体和新生代创造和引入的(卡斯特,2007;蒋原伦,2011),否则新技术不会自动产生文化意义上的作用(蒋原伦,2011)。而且研究者们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低准入、参与、互动、交互、自由、平等和分享”等特征,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可能产生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改造我国传统社会的零和博弈关系、尝试与生人交往、建立信任等,而更加接近公民社会(杨伯淑,2009)。

以上即关于技术(包括新媒体技术)与文化方面的两派观点,从中可以看到这一问题上大家的分歧所在,即或认为文化向技术投降;或认为人才是技术和文化的主宰,具有充分的能动性。技术与人的关系对应的正是技术行动者与文化的关系。当然,这里需要澄清一点的是,在前面论及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论述时,笔者比较武断地将波斯曼归入了对技术对文化影响的“悲观论调”当中,这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波斯曼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在《技术垄断》一书的最后一章,他写道,生活在迅猛发展的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的合理回应可以分为两部分:“无论文化做什么,个人能有所作为;无论个人做什么,文化能有所作为(波斯曼,2007:109)”。他认为人们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波斯曼,2007:109)。他同时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参见:何道宽,2006)。”从这一结论式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波斯曼对于人类可能战胜困难、战胜苦难是很有信心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对于“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强调,其实是表达他对此的充分的担忧,他希望通过对众人的一记棒喝,让人们认识到有这种可能性,从而警醒,并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他的论述更像是一篇“警世恒言”(何道宽,2006)。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与卡斯特、威尔曼等人对未来的预期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关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很难给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开放源代码参与者作为技术的操纵者,他们的行为可能与文化产生什么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具有什么样的结果,对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分析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能仅从这一章的分析和总结中得出,在本书的研究结束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7.1.2 互联网技术的政治秉性

关于技术的性质以及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社会科学中有很多相关的论述，比较集中的就是“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争论。如麦克卢汉就经常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发展是内生动力的唯一结果而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塑造社会来适应技术模式”（Winner, 1988: 35；参见：查德威克，2010：22）。社会决定论是指技术是中立工具，非技术动力（如社会阶层、政治权力，甚至个性人格）对它们的设计和控制具有独立影响（参见：查德威克，2010：22）。由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在论及技术的影响时都显得简单武断，查德威克（2010：24）引用兰登·温纳的思想认为，技术具有政治属性，同时在政治背景中发挥其功用，因而他用去中心化、参与、社团、全球化、后工业化、理性主义、治理、自由主义等八个主题来说明互联网技术的政治属性。

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开放和无门槛等特性，使得技术本身就天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秉性。如卡斯特（2007：30-31）认为，互联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是指技术架构的开放性，也是指社会/机构组织的开放性，互联网架构的开放性是其自我进化发展的主要力量来源。这种开放性也会赋予使用和创造互联网技术的人以一定的政治隐喻。查德威克（2010：21）认为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人是新的政治掮客：“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然政治性，但是它的政治性是政治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掌握网络结构生产技术的人——除公司和政府决定着互联网上运行的软硬件的类型之外——是新的政治掮客。”

7.1.3 开源领域有关自由的争论

“自由开放源代码运动”中对自由的不同态度，主要体现为“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的分歧。如果说“自由软件”往左，“商业软件”和“专有软件”往右，那么相对来说“开源软件”则在二者中间。斯托曼被认为是“自由软件之父”，积极倡导“自由软件”的精神，比尔·盖茨及其微软公司是专有软件、商业软件成功的典范，而托瓦茨、雷蒙德等人则是“开源软件”的代表，他们用实践和理论去论证“开源软件”的益处和可行性，不赞成过度强调“自由”精神。

“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确实存在分歧。

雷蒙德早在《开拓智域》一书中专辟一节来说明“玩家的意识形态多样化”。他在书中写道：“互联网开放源代码文化的意识形态（玩家们说他们所相信的）本身是相当复杂的话题。所有成员都同意开放源代码（也就是，软件可以免费散播及能够毫无困难地演化及修改成适合自己所需）是件好事，并值得投入大量群体的力量。这样的一致很有效地定义了文化的成员资格。不过，有许多理由值得我们考量，尤其是许多个体及次文化信念的多样化。”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开发者的共识在于：开放源代码是好事，且值得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做。这种共识的文化是一个基础。但是，文化信念的多样化仍然不容忽视。他将此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狂热；一种不论开放源代码开发仅仅是个到达终点的便利工具（好的工具、有趣的玩具及有意思的游戏）或者本身就是终点的热情。”他所说的正是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分歧。

1. 斯托曼：倡导“自由软件”精神的堂吉诃德

雷蒙德在文中是这样描述自由软件的狂热分子的：“狂热之辈会说‘自由软件是我的生命！我生命的意义在于生产有用、优美的程序及资讯资源，然后送给人家。’”他说的显然是斯托曼。斯托曼代表着激进的自由软件一方。

从自由软件创立伊始，斯托曼就是“自由”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他曾详细说明某个程序成为自由软件，那么意味着：（1）你拥有运行该程序的自由，而且可以用于任何目的。（2）你拥有修改该程序以适应你个人需要的自由。（为了在实践中使这一自由成为可能，你必须能够获得源代码，因为没有源代码而试图修改程序是极端困难的。）（3）你拥有再发行拷贝的自由，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收费的。（4）你拥有发行该程序修改后版本的自由，从而使社团可以从你所做的改动中获益。

从他的表述可以明确地看到“自由”的理念在其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即对自由的维护是其自由软件创立的思想核心。而建立著佐权（Copyleft）的GNU GPL协议就是在软件开发和传递过程中实现他这一思想主旨的途径。

他也曾继续强调，“GNU的目的是给用户以自由，而不仅是为了争取大量用户。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某种发行条件，以避免将GNU软件变成专有软件。我们使

◇ 开源文化在中国

用的方法称为Copyleft（版权所无）”。

Copyleft（著佐权）与Copyright（著作权）相对应而提出，它并没有推翻版权法，但利用了版权法，却又跨越了版权。按照斯托曼自己的说法，这是“一种将软件私有化的手段转变成了保持软件自由的手段”。为了保证软件自由，斯托曼所创立的Copyleft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给予任何人运行、拷贝、修改以及发行改变后程序的许可，但不准许附加他们自己的限制。从而保障了每个人都有获得‘自由软件’的软件拷贝的自由，它们成为了不可异化的权力。”（Stallman, 2000）

同时，斯托曼是反对软件专利的。他在描述自由软件发展所面临的障碍时写道：“我们面临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软件专利，它可以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内禁止算法和特性为自由软件所用。”反对软件专利，与其反对专有软件、私有软件的初衷是一致的。

因此，提倡自由、反对软件专有、用Copyleft跨越版权，就是斯托曼的自由软件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

但自由软件在推广上却失败了。斯托曼的自由软件思想的推广是从两部分着手的：一、自由软件的GPL协议本身具有“传染性”，即所有使用该软件的人，只要改动了该软件，都必须继续将它开源出来；即使只是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其他部分使用的是自己的私有软件，那么协议也要求包含着自由软件的这个整体软件都必须开源出来。二、斯托曼认为，由于“坚持自由的意志和毅力”很重要，因此当要吸纳新用户加入自由软件社区时首先要把这一观念和宗旨灌输给他们。但他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这一努力正在失败：“吸收新用户加入我们这一社团的努力要远大于将我们社团宗旨传授给他们的努力。”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斯托曼的这两种最基本的推广方式让人们望而却步，导致推广的失败：一方面，自由软件的GPL协议具有的传染性使得商业公司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斯托曼对“自由软件”精神的灌输也让崇尚自由（不被人影响政治观点的自由）的软件工程师们心生反感。

斯托曼对其自由软件的推广和维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很狂热。他不仅反复强调GNU软件的开发本质就是为了拥有自由，“它们来自一种观点和计划，

而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且在面对后来的开源软件时，表达了不满，而且是越来越突出的不满：

但要注意，一些将自己与“开源软件”（Open Source）概念相联系起来的公司，事实上是将他们的业务建筑在与自由软件一起工作的非自由软件上。这不是自由软件公司，而是专有软件的公司，他们推出产品诱惑用户远离自由。他们美其名曰“增值”，这个名字也反映出了他们希望我们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方便超越自由。如果我们相比之下更珍视自由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产品称为“减少自由”的增值品。（Stallman, 2000）

他认为开源软件是“诱惑用户远离自由”，是减少了“自由”。在斯托曼的理论体系中（如GNU宣言），伦理和道德是置于软件创新之上的，也就是说他格外强调“自由”这个出发点和目标，如若忘记了这个出发点和目标，他觉得是不可容忍的。

然而，自由软件精神的推广并没有成功，相反开源软件获得了众人的认可。这种现实也使得斯托曼陷入一种困顿当中，使其没办法回避现实，因而慢慢接受了自由和开源并提，即“自由开放源代码软件”（FOSS）。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他放弃了对“自由”的诉求，他的观点反而越来越激烈，他认为，软件是否自由关乎“善恶”之分，言论越来越“偏激”了：（1）他将软件是否自由上升到了善恶层面，如“非自由软件是恶，而自由软件是善在IT领域的部分体现”。（2）他认为便利性远不如“自由”更重要。为了保证使用的自由，他避免使用任何专有软件，也采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不被窥探隐私。他认为，“你必须做出选择：是自由更重要，还是便利更重要？在获取你的数据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场合，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或是受到限制。”（3）他认为自由软件急需推广，而且由于各国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了Windows等非自由软件的风险，而这正是自由软件发展的一个契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仍有一些斯托曼的信徒，而他们作为“狂热”的一派，经常有人将其同“共产主义”相对照和关联，并将他们称作自由软件的“原教旨主义者”，等等。斯托曼近年来与中国开源界

◇ 开源文化在中国

有着更多的来往，在面对新闻采访时，这位早年声名卓著而现在被认为是狂热和顽固的黑客说道：“我不会妥协，也没有寻找退缩的借口。”很像追求理想的堂吉珂德。他在国际开源界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但在中国却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和追随，但这种追捧更多地是将其当作“开源领袖”和“黑客大牛”的身份来追捧。

2. 托瓦茨和雷蒙德：“开源软件”的实干家和理论家

托瓦茨创立的Linux，最早是依据“自由软件”的协议来开发的，但后来越来越趋向于雷蒙德提出的“开源软件”，其之前根据“自由软件”协议开发的版本Debian仍被保留且现在仍然存在。但真正让Linux得到长足发展的是“开源软件”，也正是托瓦茨的这一公开源代码的举措同“开源软件”理念的碰撞，才使得Linux得以风行。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托瓦茨是开源软件领域当之无愧的实干家和代表人物。

雷蒙德是开源软件领域的理论家，他撰述了一系列著作（被称作Eric Raymond 五部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教堂与集市》，在这本书中他主要论述了软件开发模式是由下而上的市集模式，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大教堂模式；黑客们所遵循的文化是礼物文化，而不是交换文化。

雷蒙德从一开始提议“开源软件”，可以说就与斯托曼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分道扬镳了，软件界人士也很自然地将他们对比，Bruce Perens在文中如此描述：

更糟糕的是软件产业界的人士有意将Raymond与Stallman进行对比，似乎他们两人不是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相同的一个问题，而是为不同的哲学思想而辩论。我请Stallman与Raymond在Linux Expo和Open Source Expo上彼此辩论大概使局面变得更坏了。现在人们习以为常地将他们两人看成通过E-mail进行辩论，从不旨在于出版，只是以一种每日在线沙龙的面貌出现的辩论对手的角色。鉴于此，我建议Raymond将两人辩论趋向缓和，以至于他再也不愿进入了。

托瓦茨和雷蒙德可以说是软件开发领域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他们代表着这样

一批人“一种不论开放源代码开发仅仅是个到达终点的便利工具（好的工具、有趣的玩具及有意思的游戏）或者本身就是终点的热情。”

雷蒙德认为，早年间，实用主义就已经通过玩家们拒绝完全使用 GPL 版权及 FSF 章程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一直到 Linux 在 1993—1994 年间开始爆发，实用主义者找到了很有力的基础。虽然托瓦茨从未反对过斯托曼，但他设下了商业 Linux 成长的典范，“透过保证商业用途软件上的高品质，及轻微地嘲弄清教徒及狂热文化中的元素。”雷蒙德认为，这种文化的实用主义者由早期（开放时期）的 UNIX/Internet 的根发芽，除了 Linux 之外，还有 Larry Wall 带领的 Perl 文化、John Osterhout 创建的 Tcl 及 Guido Van Rossum 的 Python 语言。他认为，这几个团体都是通过发布其非 GPL 版权方案来表达其意识形态。

Bruce Perens 在《开源软件的定义》一文中表示，开源不仅仅表示开放程序源代码。从发行角度定义的开源软件必须符合如下条件：（1）自由再发行。许可证不能限制任何团体销售或赠送软件，软件可以是几个不同来源的程序集成后的软件发行版中的其中一个原件。许可证不能要求对这样的销售收取许可证费或其他费用。（2）程序必须包含源代码，故意地扰乱源代码是不允许的。（3）派生程序。许可证必须允许更改或派生程序。（4）作者源代码的完整性。（5）无个人或团体歧视。不能有任何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歧视。（6）无领域歧视。例如不能限制程序应用于商业领域。（7）许可证发行。伴随程序所具有权力必须适用于所有的程序分销商，而不需要这些团体之间再附加许可证签字盖章。（8）许可证不能特指某个产品。（9）许可证不能排斥其他软件。如不能要求所有与之一起发行的其他软件都是开源软件。（10）许可以实例。GNU GPL、BSD、X Consortium 和 Artistic 许可证都是我们认为符合开源软件定义的许可证，MPL 也是一样。

这个定义与自由软件定义相比，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开源软件的商业使用更加便利。之前的自由软件虽然名义上不排斥商业（斯托曼，2000），但是它实际上阻碍了商业的广泛介入。有了开源软件的许可，商业合作就很顺利了。

雷蒙德在《黑客的报复》一文中回顾了他对自由软件的认识，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自由软件”这个词这些年给我们的运动很明显地造成了极

◇ 开源文化在中国

大的损害，其原因部分产生于众所周知的对“free-speech/free-beer”的含糊不清，大多数原因来源于更坏的事情——将“自由软件”这个词与对知识产权的敌意、共产主义和其他观点联系起来，这几乎不可能使它受到MIS经理的喜爱。……

但雷蒙德等人并不是从此将开源软件同自由软件划清界限，只是他们更强调开源软件的实用性，避开斯托曼所强调的自由的政治性。雷蒙德在《开放源代码的FAQ》中指出：“开放源代码软件是自由软件的营销手段。它是对自由软件的支持，更倾向于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肆宣扬。成功的主体并没有改变，失败的态度和象征主义却变了。”

而在开源软件领域商业运作得最好的公司当属Red Hat公司（红帽子公司），他们对待专有软件的态度不如自由软件推崇者那么强烈。“正像具有领导地位的Linux发行公司Red Hat公司的Bob Young所说的，他的目标不是要篡夺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金字塔顶点的宝座，而是要缩小操作系统市场的含金量。”（参见：Tim O'Reilly, 1999）

推崇软件合作创新方式、促进开源同商业的结合、对激进政治的反感、对专有软件的态度更为平和，可以说是“开源软件”意识形态的特征。

7.2 基于科学精神的技术创新文化

卡斯特（2007：43）所谈到的技术精英文化植根于科学主义精神和学术传统，而黑客文化的核心代码来自技术精英文化。在中国开放源代码参与者身上，基于科学精神的技术创新文化表现得十分突出，即在技术创新与自由价值两方面，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创新的价值，将其视为关键目标。这直接表现为当他们谈及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时，所谈到的绝大多数目标都与技术创新有关。自由的诉求被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在次要的位置。

7.2.1 “用代码说话”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开放源代码领域，“技术为王”的特征十分明显。开源界被大家所公认的技术牛人，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爱戴，被认同为“领袖”。在实际的开源

软件编程中，代码质量也受到高度重视。从访谈和观察中看来，他们用来评价代码质量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代码实用，能解决具体问题；二是代码简洁、易读。代码要实用是最基本的要求，代码需“易读”则是为了合作的要求，需其他编程人员能够轻松看懂才可能达成开源的分散性创新合作。代码要“简洁”，是与易读性充分相关的，但对简洁和整齐的高度追求，有时也代表着一些开源开发者们对编码艺术的高度追求，即由“技术”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技术匠”上升为“艺术家”。

大多数开源软件开发者在开源参与中享受着“创造的乐趣”，并将能参加到国际开源项目当中、能够解决困难问题、写的代码能为很多人使用视为荣耀，将自己被同行所认可视为心理的满足。从这一点上，中国开源参与者们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

对一个匠人来说，创作一件有情调的作品，一定是出于对精湛技艺的追求。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目的，固然可以写出高质量的软件，代码本身却容易缺乏灵气。代码的艺术和美，与文学略有共通之处，在于强大的表现力。缺乏灵气的代码只顾平铺直叙，是没有生命力的机械；好的代码越是简单明了，越是做得到更多事情。（弓辰，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编程的乐趣在于享受这份创造的快感：他不只是在敲代码，而是在开动脑筋调教程序，增益其所不能。甚至会有一刻在心中大呼：终于不再像菜鸟一样写程序了！谁愿做只会搬砖的码农？定要像设计师那样思考，才称得上有手艺的编码匠。（弓辰，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人类阻挡不了技术的变革前进的脚步。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机遇稍纵即逝。尽早掌握未来的主流技术，利于我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王鹤，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全中国都有自己写的代码，这难道不是件很爽的事情吗？（Wendal，参见：CSDN【开源专访】）

◇ 开源文化在中国

在代码里面看到有pull request进去的代码，这就是我的动力。（Ywjno，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从上述可以看出，开源参与者们将自己视为“匠人”或者“设计师”，将自己的工作与外人所想象的枯燥重复相区分开来，体现了他们对技术本身的重视，以及对代码质量的高度要求：既要简洁易读，又要实用有效。

由于技术为王，技术上优劣高低很好判断，只需要“让程序跑一跑”（14号受访者）就可以。因而访谈对象们一般认为技术上的争端很容易解决。即，大家若是对代码发生争执，可以直接运行看看，看谁的代码最好，就自然平息了矛盾。在这方面，大家的判断不需要什么权威的认可，只用相信“眼见为实”就可以。不认权威，只认真理，从这一点上，开源参与者们也充分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而且由于信奉“技术为王”“用代码说话”的原则，技术团队、技术社区里显得十分民主和开放。

社区里面我们小伙伴肯定也会有冲突，但在技术上面有冲突，其实不可怕。程序员有冲突，很简单，那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PK一下。对，就是这样，就是哪个东西效果好，就是用事实说话，所以其实技术社区一般都是比较单纯的。（14号受访者）

一个是对错比较明显，第二个就是说，这里面的人，没有说特别强势的。比方说在我们团队里面，我算比较强势一点的，但是大家可商量，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说这样做一定是错的，那样做一定是不对的。就不会有这个。我们俩都会说A好，大家也都觉得A好，也都是殊途同归的一个说法。很少说在我们提出两个相对的方案出来，没有这种情况，就不会说是相反的东西。（11号受访者）

像那种文人相轻，（我们）那还真不会。就像我们团队里面，包括社区里边，就是看你的能力，看你的贡献多，看你的热情，是完全没有年龄大小的。就比如我们团队里就我现在的Board里面的（某某）他才二十三岁吧。但是我们团

队里面还有一些30岁、40岁的人呢，这没关系，就是说这确实是看你的基础，别人十几岁就开始做社区了，那你怎么能比呢？这样就像是刚才我举的香港那个学生，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他英文名字叫小孩，你就知道是个小孩。然后这个16岁的小孩我觉得他经验比我还丰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经验比我还丰富。那我就认他，他说什么，我就听他的，比如当时，在那个应用里面所有的这个版本的发布也要涉及很多流程的，也是一个规范的怎么做，怎么先做测试，还是怎么反馈怎么发布，等等。（9号受访者）

对，争议肯定是有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谁谁就觉得你这段写得不合格，然后让你重写，就觉得你这不符合要求，但是他会提出，就是要有凭有据的论据证明你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是不符合要求的嘛。（10号受访者）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开源纯技术领域很难有冲突，因为“对错明显”，他们看重的是向前推进，而不屑于因技术之外的事务而耽误时间。从访谈过程中还发现，受访对象们对于技术所具有的能量是有充分信心的，面对着云计算等新技术所带来的技术与控制的问题，他们也多表现出信任人能够充分控制技术的走向，相信垄断的那种情况不会发生。

卡斯特（2007）认为，互联网文化植根于对科学的共同追求、凭卓越的学术而建立的声望、同行监督评审、所有研究成果的公开性、尊重发明者或创新者等学术传统。这些在中国开源参与者身上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他们信奉真理，相信代码本身能说话，信事实胜过争执；他们追求进步和创新，将为开源项目或事业做出贡献视为荣耀；他们相信人能控制技术往良性的轨道发展，表现了科学理性精神，相信人的理性力量；他们崇拜技术牛人，但这些牛人是靠代码实力说话的牛人，而不是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开放源代码参与者尤其是开发者们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信奉真理、相信理性、追求科学发展与进步，同时还由其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中国开源参与者们用自己的实践，书写了同传统科学家们一样的学术和精神成就，对社会是有较大意义的。

7.2.2 “不重复造轮子”的创新意识

开放源代码运动在创新上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其合作性。要达到充分的合作和促进开源软件开发的效率，“不重复造轮子”就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

我一直很喜欢开源文化，我觉得当今软件技术的进步几乎就是由开源所推动的。程序员靠代码说话，共享自己的想法，不用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重复上。

（云风，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俺的主张是不重复造轮子，除非需要把轮子造得更圆。……正因为在这些优秀开源软件的基础上开发，Rime才得以集中精力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输入法难题。（弓辰，2014，参见：CSDN【开源专访】）

但也有人在进行表面上“重复造轮子”的事情，引起关注和讨论：

前端社区的却会经常出现功能类似库、组件等，看得出整个社区氛围非常活跃。从某些角度看，“重复造轮子”并非坏事。为什么会有重复，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使用场景不同，某个开源组件不能满足这个场景，这时候有两个选择，改进它或者是重写一个，当重写的成本低于改进的成本的时候，当然是选择重写一个。（Koala，2014，参见：CSDN【专访】）

很多优秀的项目，就是从重复造轮子中脱颖而出的。就如Koala，在Koala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工具了，但它们功能与体验做得不够，我们想要更好的工具。Koala某些程度上也是“重复的”，但是它的改进大于重复。众多的重复的轮子丰富了我们的选择，也不断地在进化技术，所以重复造轮子没有关系，只要你比其他做得好，你有差异化的地方。（Koala，2014，参见：CSDN【专访】）

从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情况来看，能不能“重复造轮子”的核查标准其实就是是否有助于创新。

7.2.3 区分“黑帽子白帽子”的价值自觉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开源参与者们都很在乎黑客（Hacker）和骇客（Cracker）的差别。正如卡斯特（2007：58）所说：“主流的黑客文化对破坏者十分敏感，因为不负责任这一污点会玷污整个社区，并被媒体扩大化。”受访者在提及“黑客”名词时强调他们所说的“黑客”同普通人眼中的“黑客”的差别。对于入侵系统的黑客，他们也会因为其动机和效果，将其区分为“黑帽子”和“白帽子”。“黑帽子”是指入侵系统而造成危害的黑客。“简单地说，白帽子就是做好事的，黑帽子是做坏事的”（子柳，2013）。“白帽子”在开源参与者们的价值观中是值得赞赏的，而“黑帽子”则被唾弃，甚至在求职时受到抵制。

关于这一点，一位受访对象很详细地进行了说明。黑帽子会通过发现漏洞甚至是制造漏洞而进行敲诈，白帽子则较为“行侠仗义”，会告诉你系统的漏洞提醒你去修复。这种“白帽子”受到大家的敬重，也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所以现在的黑客已经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指我对系统非常熟悉，我能做一些入侵的工作。但这个入侵不等于破坏，入侵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有一些入侵，有些这种技术我是出于保护的。比如中国像WuYun社区上面有叫白帽子，或者国外有叫红帽子，红帽子就是我会去找你说这种软件有一些什么漏洞，但是我不破坏，找到漏洞会很善意地告诉你，然后也许会问你要一些好处；但是黑帽子的话他会敲诈，要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我跟你要100万，这属于敲诈，但是很多人就是我不明确说要什么，能不能给我个小礼物，或者请我吃个饭。某某社区是中国的一个社区，它上面就是有一群，它叫白帽子，就是他们会去找一些厂商的漏洞，然后有漏洞就会报告到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他们会通知厂商，给厂商一段时间，给你15天或者一个月的时间，你先去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他再把这个漏洞细节公开出来，这样的好处是第一这个漏洞不会对厂商造成危害，第二这个漏洞反映出来之后更多的厂商能自我检查，能够去修复这些已知的漏洞，所以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会鼓励厂商给白帽子一些好处，你可以给他寄一些小礼物。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白帽子找了我

◇ 开源文化在中国

们一个漏洞，正好是中秋节，我们就寄了一盒月饼过去。也有一些公司可能说这个白帽子给我们找了很多漏洞，我直接给他提供一份工作，问他愿不愿意过来。

（14号受访者）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样的，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黑客来说，多多少少都会做一些攻击或入侵的事情，这个要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找到网站的漏洞，或者是为了做技术尝试，进去之后不做破坏，这些我们认为好的（不过现在刑法修正案有了明确规定，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所以不能提倡）。另外一些人以利益为目的，这就涉及黑色产业链了，其实这一类人并不一定要掌握多深的黑客技术，有些是猜别人的密码，甚至先取得别人的信任，发给对方一个木马，这就不是黑客技术了，而是骗术。（吴翰清，2013，参见：《淘宝技术这十年》）

对于有“黑帽子”劣迹的程序员，由于对其人品和行为的不认可，用人单位倾向于不录用。

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就很小心，要看他以前做过什么，历史不清白的是不能要的。（吴翰清，2013）

从中国开源参与者们对“黑帽子”“白帽子”旗帜鲜明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开源参与者们对于开源软件为谁所用、为什么目的而用是心里十分明晰的。即开源软件是为了有同样需求的人所用，是为了技术创新和进步的目的而用，是为给众人造福而用，而不是为了破坏。因而，部分骇客即“黑帽子”的破坏行为是为他们所不齿的。这很明显地表明了他们的价值观，即，是非分明，懂得善恶是非的情况下再谈技术，否则有技术也只是为害社会。

7.2 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诉求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开源参与者的技术文化方面，是以“技术创新”

作为第一要务和追求的，对于斯托曼们所追求的软件使用的“自由”，被放在第二位。这与国际上的开源文化现状是比较相符的，技术创新是关键目标，“个人创新的乐趣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卡斯特，2007）。

卡斯特（2007）在论述互联网文化的四个结构特征即技术精英文化、黑客文化、虚拟通信文化（即虚拟社群文化）和企业家文化时，认为它们的广泛传播为自由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意识形态并不是基础性文化，因为“它没有对互联网技术系统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自由有很多用途”（卡斯特，2007：42）。即他认为，在互联网文化中，自由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成分，但并不是基础性的文化，在技术创新的目标面前，自由是放在次要位置的。

黑客文化一般被认为是最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互联网文化。但卡斯特还是将黑客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他认为在社区内取得地位的满足感和创新的内在快感，是黑客文化的品质之一。他谈到的黑客文化这一点同“技术精英文化”并没有区别。但他同时重视自由的意识形态的黑客亚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政治原则和个人反抗的基础上，代表人物是斯托曼。

理查德·斯托尔曼认为技术的精湛性进步对自由软件的根本原则而言是第二位的，在他眼中，这一根本原则是信息时代言论自由的核心成分。他的自由软件激进是围绕着保护程序员的产品权利以及动员黑客社区共同行动使其集体创新免受政府和公司影响而进行的。别的黑客团体也是围绕着自由政治原则建立的。（卡斯特，2007：56）

而在中国开放源代码参与者的技术文化当中，从笔者目前的访谈和观察来看，“技术精英文化”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扎根于学术和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的文化信仰表现得更为突出，而自由的诉求相对弱化。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与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是十分相关的，主要原因是在全民关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开源参与者更关注技术本身，期望实用的技术能为社会、经济带来改益。总体上，中国开源参与者对开源的态度上是以实用主义为主的，其有关“自由”的诉求也是有节制的诉求。

7.2.1 兼容并包的实用主义

在研究的深度访谈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探寻受访对象们对于开源软件、自由软件的态度，发现他们“中庸”和“实用”的态度十分明显。在国际开源界存在的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商业软件的三种类别倾向时，绝大部分中国参与者赞同实用主义的开源软件，细分起来，也仅是更偏自由或更偏商业的程度稍有不同。

中国开源参与者的“中庸”和“实用”体现在，大多数人对于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的分歧是没有感觉的，除了少数开源宣传活跃分子之外其他人很少知道二者详细区别。大部分开源软件与自由软件不同的参与者，他们认同开源的合作创新的意义，却并不愿意卷入自由、开源软件的纷争。

6.2.1.1 更偏自由软件的一方：不认同，但跟你玩

更偏自由的开源参与者在受访者当中属于少数，他们的特征往往是更为理想主义。他们秉持着“自由软件”的基本精神，但远没有斯托曼那么激进。

就是为啥你坚持下来，实际上对外我不是开源运动的倡导者，我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倡导者，自由软件跟开源软件还是两个概念。虽然这里也有一种论断说自由软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现在的这个闭源软件和开源软件变成两大主流，若没有自由软件的基础实际上开源可能就不存在。（11号受访者）

该受访者还描述了由于自己的观点与主流观点的不完全吻合，所以在公开场合难以表达自己的倾向，反而是努力与开源软件信奉者们一起促进相互理解。

所以现在就是说大家都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反正我知道你是咋样，我也知道你是咋样，不要相互看不起，相互觉得理解，觉得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在中国的事根本就分不清楚，所以就公开上一般不大说了。就是说，开源和自由软件是，我虽然不认同你的游戏规则，但是我愿意用你的游戏规则来跟你玩。（11号受访者）

他也抨击了目前国内开源的功利氛围：

当然是这种人（指开源布道者）越多越好，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啥呢，像这种布道者大多数，大多数是各大公司的代言人，对吧，他们都是抱着目的来宣传开源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区或者服务平台，对吧，产品竞争最终是品牌的竞争，你卖东西，京东和淘宝你卖我也卖，你卖的便宜10块钱我也能便宜10块钱，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吸引顾客？OK，开源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说我更开放，大家更喜欢用我的接口，等等，现在老百姓不懂，那么大概有这么些人他们制造出这么一个理由给你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整个开源文化或者里面的宣传可能（没什么意义），只是说开源这个词不断地曝光。（11号受访者）

从他抨击国内为凑热闹而宣称开源、为企业利益而参与开源的话可以看出，他是反对这种开源的不纯粹的。他认为这些杂质的出现，会影响到中国开源文化的传播。与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其它开源参与者：

Linux Deepin 项目的初衷很简单也很单纯，就是几个创始人的操作系统梦想，大家希望通过努力给全世界带来更自由、更佳体验的操作系统。（王勇，2013，参见：CSDN【专访】）

这次的GNOME.Asia峰会和三月份的OSTC大会我都是核心成员之一。这两个会议的最主要区别：一个是真正的开源社区大聚会，一个是“有社区范儿”的开源商业会。一个是社区人人获益，一个是处处体现价值观导向的伪善。一个是对所有人友好，一个只以自身利益为准绳。一个是志愿者出力奉献，一个是商业公司处处渔利。一个构建人人平等共荣的大社区，一个构筑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封闭生态系统。最关键的是主办方，一个是完全社区草根，一个是巨大利益诉求的商业公司。开源不排斥商业，但请先学会无私贡献再图谋渔利，请收回伪善和虚假吧！

◇ 开源文化在中国

现在七宗罪凑齐了最后这一个：根本不懂开源，也不懂社区。却自称开源社区运营？！滑天下之大稽也！（26号受访者）

上述内容表明了26号受访者对社区精神、开源精神的看重。在接受我的邮件访谈时，26号受访者更详细明确地表明了他对于开源目的和诉求的看法：

先来说开源的目的。从最初GNU和自由软件开始，源码开放的目的就是一种保障自由的手段，保障软件的用户、开发者处在平等的地位上。而最近几年开源的目的依旧没变，技术创新和反对大公司垄断是随开源伴生的副作用，包括开源降低了开发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产生的本源，是因为用户和开发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差别而产生的。这是我的理解。（26号受访者）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开源的直接目的既不是技术创新，也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平权和协作。具体到开源社区中，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运行规则就是“自由和贡献相对等原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要想在开源社区中获得额外的权利和权力，也就是除去开源本身所赋予的源码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和权力，比如社区领导人的参与权和表决权、源代码的决策权、人员任免权、提交到主流代码仓库（比如Git）的权利，或者使用特定域名的邮件转发服务、Jabber服务，等等。要想获得如上这些权利，就需要与之相对等的贡献，贡献越多获得的权利也就越大。比如GNOME基金会的董事，是由GNOME基金会成员匿名投票选出，而要想获得投票权必须是GNOME基金会成员，成为基金会成员则必须具有一定的贡献（代码贡献、宣传贡献、金钱贡献均可），并被至少两名其他基金会成员提名。这里就体现了贡献和自由（也就是权利）的对等原则。也就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机会，要想获得更大的权利，就必须付出相应的贡献。开源社区保障了这种基本原则得以顺利实施，同时开源这件事又可以保障软件开发活动的协作更加稳健和顺畅。（26号受访者）

7.2.1.2 中庸的一方：兼容并包，认同合作创新方式本身

这是大部分开源参与者的态度，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不会细致区分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而是取其“最大公约数”即共同价值，认可合作创新这种方式本身。不少受访者提到应该对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兼容并包。

对，我们其实在做很多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提了开源软件，Richard Stallman就会来信说你们一定要加上“自由软件”，好，我们加上了，我说可以。（10号受访者）

对自由软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但是对于开源软件的话，我觉得它们的存在一个是提供多样性、多样选择，第二个就是鼓励用户去创造互联网，所以是鼓励创新的，第三个就是从legal层面来讲的话，这个也是消除盗版，让大家用得更加正规一些，不要用盗版的软件。（15号受访者）

这俩（指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我还真说不清楚它俩有什么本质区别。（23号受访者）

技术人员对于创新可能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即便我现在在公司里做，我也是在想着，有什么新的空白需求，如果可以的话，也是要做一做，我想很多人也会这么想吧。……而开源这种一起合作的方式，是加快创新的方式，这个是我们在乎的。（23号受访者）

我觉得最打动的人的是，他这个东西可能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做出来之后，它很先进，他无偿地捐献给其他人去研究、学习提高。这个就是说为技术进步做贡献。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让人佩服的。因为你想，如果大家都闭源，那么你想肯定你在这个领域你知道得非常多，他在这个领域知道得非常多，其实我们相互之间不太清楚，就是不利于共同进步。（23号受访者）

◇ 开源文化在中国

大部分参与者秉持的只是开源软件简单、实用、可以用来学习和提升等想法，并没有过多的意识形态上的考量：

其实我对开源没什么执着，真正让我喜爱甚至执着的是 Linux 这个开源的操作系统。因为我觉得它和 Windows 相比起来，更简单、好用。（陈欧侃，2014，参见：CSDN【专访】）

中庸不仅体现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上，也体现在开源软件和闭源软件上。

很多这样的人。那个共性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我觉得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多了，也看到微软跟很多这种开源界的人在合作了，就是互操行性的项目呀，（开源和闭源）这种敌对的情绪慢慢少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两边都可以，我选择开源是我对产品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微软也挺好的，微软有它好的地方。就是那种宗教级别的那种人越来越少。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两种都接受，这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通用的。（13号受访者）

7.2.1.3 更偏商业的一方：开源只是一种商业模式

如果说中庸一派是把开源仅视为一种软件开发模式、一种合作创新的值得借鉴的模式的话，那么，在我国开源整体生态中，将开源仅仅视作一种商业模式的，也不在少数。有多位受访者表示，开源不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它仅仅是一种商业模式：

对，就是回到跟这个企业的关联性，企业用你这个开源软件，它不是因为你是开源的才用你。很多人会搞混这一点，就是说开源变成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信仰。……就是说不是因为你的宗教理念，不是因为你的这种狂热影响了你的企业，而是你的东西够好。……所以我认为开源闭源不是宗教的比较，而是一个产品上的比较。对不对？你看，对很多客户来讲，我就是需要一个给我做好的，一个保证。因为在企业我们老讲，企业只有三个诉求点：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和高

性能。对不对？就这三样东西，你这个三样东西满足了，其实开源、闭源没有差别，但如果是说，那个企业说，我需要性能上极致，那我给你个开源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挑。（13号受访者）

特别中国呢，很容易就把开源跟你的道德关联到一起，我是绝对反对这个的。（2号受访者）

为什么呢？你这就进入一种商业模式了，或者说社会伦理，这就不是咱们那个哲学意义上的。说你看，你做起来我免费用，你看我虽然免费用，但是我还不能自由地用，我用了你还希望我有某种回报。是吧，这已经是违反咱们的自由了。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尊崇的是MIT的这种协议，我们完全是从程序共享的角度，从这种知识共享的角度。我觉得知识是自由的，它与人种与国家完全无关，但是一旦涉及社区，那就不行了。为什么要有社区，社区呢，就形成了一群人，既然有了一群人，那就有另外一群人，说两群人之间就有了竞争，有了竞争，就有各种，无论是矛盾啊，无论是各种现实的各种组织方式就都被批判了。（2号受访者）

7.2.1.4 开源参与者的价值观亦有一个变化过程

从参与者的回答来看，开源参与者们对于开源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上也有一个实际变化的过程。

不同时间对开源的理解不一致：2002年，我对开源的理解是“价格可承受的正版操作系统”——那时我刚接触Linux；2005年，我的理解是“对世界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那时我已经开始为Debian打包，同时也在为维基百科等项目贡献自己的时间；2010年，跟北京一个朋友长谈，之后写了一篇《我们赶上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尾巴》，主要是对GNU和GPL的一些反思。现在对这个比较问题比较平静。（李道兵，2014；参见：CSDN【OSTC讲师专访】）

7.2.2 有节制的对自由的诉求

与中国开源参与者的实用主义相伴随的是他们对自由的诉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只是在主体的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对自由的诉求是有节制的，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也是成长于技术所能发挥影响的方面。

卡斯特（2007：52）认为黑客文化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指创新的自由、运用任何现有知识的自由以及以任何黑客选择的方式和渠道传播知识的自由。即使用的自由、分享的自由和传播的自由。对这三样自由，中国的开源参与者们无疑是赞同的。但这种赞同同斯托曼的善恶论的那种狂热是有天壤之别的。

在表达对自由的态度时，中国的开放源代码参与者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没有表现出明确而强烈的诉求；但从访谈和观察中，研究者还是可以看到他们隐藏在各种话题背后的对自由的想法和态度，只是这些看法和态度所体现的诉求是比较常规的，或者说是比较节制的，与斯托曼的激烈言论迥然不同。

关于反对软件专利这一点，在自由软件时期以及早期的黑客文化时期，都是很普遍的。

微软在其著名的“万圣节文档”中写道：“Linux和开放源代码的提倡者们使这一论点日益可信：开放源代码软件至少和商业软件一样棒……开放源代码软件集合推动互联网中成千上万人的集体智力简直令人惊异。”^①该文件是微软的内容机密报告，主要表述微软对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态度和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某些措施为不正当竞争。该报告于1998年万圣节前被泄露，在软件业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此之后，微软与自由开源软件阵营就是明显地对立了（当然，近年来有所变化）。自由开源软件阵营，无论是哪一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软件垄断，反对软件专利化。

在一本讲述游戏发展史的《Doom启示录》中，当游戏引擎黑客卡马克听到有人劝说他将PC机（个人计算机）上的卷轴效果（最早由卡马克创出）去申请专利

① 详细内容请参见 <http://www.opensource.org/halloween/>。

时，他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你再跟我提什么申请专利，我就立刻走人！”在卡马克这位当时还年轻的理想主义程序员心中，软件专利这种东西是为数不多可以真正让他愤怒的东西。因为黑客伦理和科学精神告诉他，所有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知识、理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去注册一项专利表明“我拥有这个想法”，在卡马克这样的黑客眼里，这听起来简直荒谬绝伦。

在中国也是一样，很多人抱有同样的想法。据说，中国开源软件遇到的最恐慌的事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微软发出了一个声音“开源软件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并且列举出了一个数据：Linux侵犯了微软235项专利。微软的这个声明给开源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不仅引起了中国也引起了国际开源界的强烈反对。托瓦茨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微软侵犯专利的数量比Linux多多了，如果微软愿意公开它的源代码接受Linux同样严格的审查的话。”（doudou, 2010；资料来源：<http://oss.org.cn/html/05/n-5005.html>）

有受访者仍然认为，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反对软件专利的：

我们是非常反对软件专利的，因为这个道理，你可以这样去讲，软件是什么？软件就是代码，代码是什么？代码就是ABCD，那你能说，我写了一本书，然后你能把那26个字母给专利申请了吗？然后你写的所有的书你都要向我这26个字母交专利费？对不对？所以开源软件就是这个理念，你本来就是一组代码的堆砌，你为什么能申请专利？然后每一个人在你身上，在你上面做改进，我还要付你专利费，这个是影响创新的一种阻力——这是一种很大的思想，这个在社区里头是非常非常主流的思想。在这方面反而是中国搞得最好，因为美国对版权，对专利太在乎了。（13号受访者）

从这一点来看，反抗软件垄断和软件专利化，是中国开源界与国际开源界的共识。除此之外，对在开源基础上发展的“自主创新软件”等，一些开源参与者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正如习总书记2018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所说，“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开源参与者也十分赞成开放

环境下的创新，认为借用开源软件基础来开发软件却声称自己是“自主研发的软件”的行为，是违背开源精神的，且封闭起来之后软件的开发质量可能下降。

7.2.3 实用基础上的责任情怀

除了有节制的对自由的诉求外，很多开源参与者在自身经验和看法的基础上，对社会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表现了一定的改良社会某些弊端的愿望，体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类似的责任意识和担当。

6.2.3.1 改良中国的教育制度或计算机教育

反抗中国的教育制度，几乎是研究者在深度访谈当中感受到的中国开源参与者最明显的特点。有几位受访者本身就没有上大学，靠自己自学掌握了很多技术技能，他们对于常规的教育体制从很小的时候就不甚认同。有一些受访者虽然经历了普通的高等教育，但已经感受到这种教育的一些弊端，他们在就学时或者毕业后通过学习开源，来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对这种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质疑。在他们步入开源行业之后，他们又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开源慢慢推广到学校，推进教育本身的改进。

如这位受访对象在上大学期间，因为本专业不是计算机，但对计算机感兴趣，就到别的学校去蹭课：

我的学校，因为属于二三线的城市，本身计算机的课程就安排得不够合理，都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跑到别的学校去听课。我觉得教育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蹭课没有学分的。）对，我就是去蹭课，大冬天的一早上骑个车子，包得严严实实的，露两眼睛就这样去了，然后晚上再骑着车子回来，大冬天就那样。反正蹭课嘛，设计类的课程，好多课程都蹭，就学个入门，也不是说要把它学到多深，就是我学会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并且我能弄个简单的小东西了，就OK了。所以现在很多像PS、3dmax，很多我基本都会，包括硬件。（7号受访者）

我们当时上研究生的时候，那个导师讲开源的也很少。就经常是照本宣科，看看教材。（23号受访者）

IT技术发展得很快，但国内的这种高校的教育制度和各方面的更新速度都非常慢，很落后，学生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是生活上面用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些学生一年在学校里面，按道理来说在用纳税人的钱，若学的东西是对社会没有产出的东西，也就是说社会的投资是失败的。（20号受访者）

但是这个说穿了在中国很难，就是说很多社区之所以搞不下去，是因为我们教育有问题，因为我们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所有集体生活方式的教育核心是啥呢，要听话，任何事情都有正确答案。（11号受访者）

因为我们应试教育是单向的，应试教育是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不给你反驳老师的机会，也不给你提出你自己想法的机会，这个是最要命的。（13号受访者）

一些受访对象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们都希望开源事业能够帮助扭转起码计算机行业的教育现状。

我希望CSDN能花更多资源在教育上，比如提供更多系统性的在线课程，瞄准基础（Linux内核、TCP协议）和前沿方向（OpenStack、LXC、Docker、CoreOS等）。（李道兵，2014，参见：CSDN【OSTC讲师专访】）

当时也是发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最短时间，把这个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他们过去20多年这个教育上的一些很不好的心理，尽快扭转过来，发现最有效的就是直接开源，开源软件的这种软件工程机制。让他们去做小工程，而且用我们一大套工具，逼他们利用开源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以前学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是不可取的，而且是第一时间建立起来“为自己的代码负责”这个理念，你不是为了老板，你为自己的代码，为自己的职业荣誉奋斗这个理念。

◇ 开源文化在中国

（11号受访者）

其次，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力度还不够，一个完全开源的操作系统更能在基础科学上推动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提升，而像 Windows 这种完全闭源的系统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12号受访者）

客观地讲，学生现在的基础知识和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差（也许都去玩游戏了）。我们曾经在青岛一所高校组织了一次PHP的培训活动，活动是免费的，固定的时间我去给学生上课。从最开始的20余人报名到最后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不过，我们也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小伙子，他大一下学期就加入我们团队，和我们共事了四年左右，不过遗憾的是他有自己的计划，没有办法再继续做同事，让人惋惜。建议正在读书的同学们可以多了解下开源软件，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会为你打开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王春生，2014，参见：CSDN【专访】）

在反抗中国的教育体制方面，开源界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即王垠。王垠，四川大学97级本科毕业，保送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直博。期间曾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所就读，主要进行集成电路布线算法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因《完全用GNU/Linux工作》一文和对TeX的推广等“非研究成果的业余东西”而出名。在只剩一年就要博士毕业的时候，他申请退学，并将1.7万余字的“退学申请书”（题为“清华梦的粉碎”）公布在网上，引起舆论界一时对教育体制、理想主义等话题的热议（令羽，2012）。下面是王垠的相关博客内容：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再次“抛弃”我的博士学位。这是我第三次决定离开博士学位，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应该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因为我虽然读博士10年了，可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博士学位。我在寻找更重要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已经被我找到了。所以我的“博士生涯”其实完成了它的使命，基本上可以圆满结束了。

如果你从我之前的博文判定我现在生活在我所向往的环境中，那么你就误会了。我学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却发现学术界不再是我向往的地方。相反，它阻碍了我的前进。很显然，博士学位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被学校和学术界作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无形锁链”。你想要“博士”的头衔，那么就廉价给我们干活吧，能出论文的就出论文，能写代码的就写代码。我根本不需要“博士”这个头衔来显示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抛弃学位，离开学校，离开学术界，是一点都不心痛的。

他的这些相对有些极端的表述，虽然在开源界也仅属个例，但对我们了解中国开源参与者们想要改革教育体制的态度还是有帮助的。

7.2.3.2 反对成功学

开源参与者们默默写代码，无论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为了外在的声名和荣誉，都是一种不计酬劳的奉献。于是，这一批人反对现在甚嚣尘上的成功学就很自然了。

这么多年写呢，其实我一直是怎么回答的，为啥呢？为啥你可以挣大钱的地方不去挣，说实话我们还是被教育得好，我们好歹也是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的这么一分子。不像80后90后。好歹是有这种，以前的三观已经树立起来了，所谓真善美三观树立起来了，那么现在一切向钱看，有房有车什么的，这个叫成功学这个标准，我们不认同。（11号受访者）

从整体上来说，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智能是没有差距的，也有写得非常好的开源软件，但是如果从开源或者自由软件的生态来说的话，那中外差别太大了。最主要的差别是啥呢？就是心态的差别。中国人心态是啥呢，就是说，整个社会我感觉是比较焦虑，大家都在拼命地要好的工作，而且要稳定，要钱多。（11号受访者）

◇ 开源文化在中国

这个是说，他对物质条件的追求，导致他没有这种心理层次上的更高的追求。……对呀，你知道我们同学，我那些在英国念书的同学，很多就是本科毕业是不念书，不上班的，（他们去）游学一年，就游历一年。怎么的？就是我到这个地方了，我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去餐厅打工打一个月，然后够我去下一站的，我再去另外一个国家。很简单，人家说，我只有这一年，因为我没有所谓的工作经验可以去浪费，所以才可以这样去玩，我也只有这一年我还够年轻，可以去玩，他这样去磨炼了他的这个视野以后，他无非就是比别人晚上一班而已呀。

（13号受访者）

成功学是近年来在社会上风靡、对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种潮流，它们以赚钱多少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开源参与者们恰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抗了这一实际潮流。与成功学用钱来衡量成就相反，开源参与者们是通过自己的无偿贡献来衡量成就；与成功学追求物质目标相反，开源参与者们则是以解决了难题、更有人受益、软件被更多的人使用作为追求的目标，反映了开源参与者们更看重价值和意义的特点。

7.2.4 极化与混乱：实用主义的另一面

中国开源参与者的实用主义，使得中国的开源发展之路没有太多有关自由和开放的争论，而是较为心齐、统一地向技术创新、技术进步而努力。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开源界是整齐划一的。相反，由于大家过于“实用主义”，什么都往开源的框里装，导致了中国开源界在某些领域的思维混乱。

中国开源界人士佟辉在2014年上半年曾就中国开源界一些思想极化潮流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必须警惕的一些‘开源逆潮’”。在文中他提到的“开源逆潮”有：开源极端主义、开源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开源社区的泛政治化、过度精英化、狂热个人崇拜与寡头社区、盲目商业化等。其观点虽不一定所有人都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开源界思想较为混乱的现实情况。开源界确实也存在一些思想意识极化的现象。比如有受访者提到，在名为民族产业、自主创新的龙芯社区中，就出现了民族主义意识极化的现象。

现在的龙芯社区，也就是那个半死不活的代码仓库、一个没什么意义的主站，一个具有一些高手，但也充斥着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论坛，而作为自由软件支持者的几乎没有，作为自由软件的龙芯开发者就更少了。（24号受访者）

龙芯的技术区中，一直在进行关于中文编程有关的讨论。其理论基础是：计算机只是信息处理机，编程语言只是助记符，和中文、英文无关。这是完全正确的理论，但在随后的相关讨论中，话题和内容就越来越离谱。而反对中文编程的人则被贴上了“汉奸”等标签。

最主要的离谱内容是关于编程思想的讨论。讨论甚至认为，要把 if、while 换成“如果”“循环”的语言；如易语言，根本不算真正的中文编程，而真正的中文编程是使用中文的“思想”编程——用 C 语言等基于英文关键词的语言进行程序开发，是受到英文本身的思维和表现力的局限的，而汉语把表音和表意结合，以此甚至可以开发出大幅提高生产力的语言……

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出去，不但中文，连道家思想都混进去了，纷纷出现了“太极编程语言”“道指令”“道 CPU”等，实在令人无语。（24号受访者）

关于网络极化，学者们已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论述。如桑斯坦认为，网络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而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们所读不同，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桑斯坦，2003：50-51）。

中国开放源代码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化现象，主要是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卡斯特（2003：29）说，“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者复苏的时代，表现在对既有的民族国家的挑战及各地以民族性为基础的认同（重）建构，它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

开放源代码运动从兴起到现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即全球的软件开发联合在一起来创造优秀的软件为大家所用。它是很难对国内、国外进行严格区分的。而且由于开源软件的合作创新和其沟通交流全有赖于全球性的网络平台，

◇ 开源文化在中国

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来进行交流是最有效率、最方便的事情。而以龙芯社区中的言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言论则认为需要改英文为中文，需要将中国文化（如道家文化）灌输到开源编程过程中去，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而且它将技术领域的创新文化强行冠以政治性的话语，是一种“泛政治化”。这种貌似“保护”和“推广”中国特色的开源文化的做法，只会将中国开源活动从全球性的开源运动中剥离出来，从而丧失掉开源所能带来的各种利好。总之，中国开源环境中所凸显的民族主义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了世界开源的大趋势和环境的，与开源文化相悖。

如果说某些论坛如龙芯社区中的开源意识形态的极化是大部分中国开源参与者的中庸态度的反面案例，那么，中国开源参与者的“实用主义”除了带来技术创新的合力之外，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形成开源“乱象”。

由于奉行实用主义，中国的开源参与者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大多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拿来主义，取来就用，导致了思想意识方面的混乱，形成了不少“伪开源”和“假开源”。这主要是指打着“开源”的旗号，但并不执行开源的协议，或者不遵从开源的精神，只为了“赶时髦”或博人好感就声称自己“开源”。对这一点，开源界人士表达了不满和无可奈何。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探讨中国开源参与者的技术文化，即卡斯特所说的技术精英文化和黑客文化，主要涉及的就是我国开源参与者在技术和政治上的价值观和倾向。由于技术本身就具有一种政治秉性，因而二者实际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法完全分开的。本研究认为，中国开源参与者的技术文化主要表现为基于科学精神的技术创新文化和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诉求两方面。两方面中，中国开源参与者很显然是将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的，西方斯托曼们所奉行和强调的“自由”原则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强烈的诉求表现。技术创新文化方面，中国的开源参与者奉行“用代码说话”的科学精神和“不重复造轮子”的创新意识，并通过对“黑帽子白帽子”旗帜鲜明的区分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自觉。在对自由的态度和倾向方面，

在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商业软件三方中，大部分中国开源参与者赞同的是开源软件。他们从实用主义出发，不纠结于软件在政治上的争论，而执着于学习和创新。他们希望兼容并包，将不同意见统一起来，促成合作创新的集体行动；即便是表达自由诉求，他们也仅表现为对垄断和专利的反抗等，是一种有节制的诉求表达。这一方面与中国的开源参与者在环境影响下更关注经济生活有关，另一方面也同他们表达谨慎而节制有关。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开源参与者具有很明显的中庸和实用主义倾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似隐似现地表达出强烈的责任感意识和使命感。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试图追索意义和价值，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体现出了很可贵的一面。